



道行天地

南宋浙东学派论

DAOXING TIANDI
NANSONG ZHEDONG XUEPAI LUN

王宇 著

浙江省之江青年社会科学者文库系列丛书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文库系列丛书

道行天地

南宋浙东学派论

DAOXING TIANDI
NANSONG ZHEDONG XUEPAI LUN

王宇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行天地：南宋浙东学派论 / 王宇著. —北京：中国
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2. 12
ISBN 978 - 7 - 5161 - 2258 - 7

I. ①道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浙东学派 - 研究 - 南宋
IV. ①B244. 9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5518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宫京蕾
特约编辑 张 剑
责任校对 韩 萍
责任印制 李 建

出 版 社 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网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http: //www. csspw. cn
中文域名: 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
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32
插 页 2
字 数 538 千字
定 价 7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 - 64009791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绪论	(1)
第一节 朱熹指认的“浙学”及其流衍	(1)
一 朱熹所指认的“浙学”	(2)
二 “互补”模式的出现	(7)
三 明代对南宋“浙学”的认识	(8)
四 《宋元学案》中的南宋“浙学”	(11)
第二节 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：南宋浙东学派认识史回顾	(15)
一 章学诚与“浙东学术”说	(15)
二 章学诚“浙东学术”说的发酵	(19)
三 1949—1989年：回归“对抗”	(23)
四 1989年至今：弥合南宋浙学与明清浙东学派的尝试	(27)
第三节 关于本书的写法	(30)
第一章 南宋儒学的问题意识与思想背景	(38)
第一节 “二度抽离”与北宋思想遗产	(38)
一 道统的构建与一度抽离	(40)
二 南宋儒学对北宋新儒学的反思	(47)
三 吕祖谦、陈亮对“转向内在”的忧虑	(54)
第二节 “祖宗之法”与北宋政治遗产	(59)
一 “祖宗之法”与五代政治文化	(60)
二 南宋继承的“祖宗之法”	(63)
三 “祖宗之法”与士大夫政治	(68)
第三节 “乾淳学术”的形成：陈亮的视角	(73)
一 隆兴元年：“东南三先生”定交	(74)
二 乾道元年至五年：“乾淳学术”的准备期	(75)

三	乾道五年至七年：“乾淳学术”的第一个高潮期	(77)
第二章	薛季宣与乾道末年程学的分化	(85)
第一节	程学传统中的薛季宣	(85)
一	薛季宣的家庭与程学温州一系	(86)
二	薛季宣的师承	(89)
第二节	“性不可知”与片面的“道问学”	(93)
一	自明诚与自诚明	(94)
二	制度新学何以必要	(102)
第三节	评价薛季宣所引发的分歧	(106)
一	朱熹、张栻对薛季宣的疑虑	(106)
二	吕祖谦与《薛常州墓志铭》	(110)
第三章	吕祖谦的思想转型与浙东学派的形成	(118)
第一节	淳熙年间吕祖谦思想学术的转型	(118)
第二节	围绕《皇朝文鉴》的分歧	(125)
第三节	《大事记》与司马迁	(139)
一	韩信、公孙弘与张汤	(141)
二	司马迁与《史记》	(144)
第四章	仁智二元与王霸义利	(154)
第一节	分歧的根源：仁智二元与论功计获	(154)
一	“仁智二元论”与功利主义	(156)
二	“论功计获”的工夫论	(162)
第二节	王霸义利之辩的展开	(166)
一	王霸义利之辩的导火索	(166)
二	王霸义利之辩中朱熹、陈亮的主要观点	(171)
第三节	吕祖谦与枉尺直寻	(187)
第四节	王霸义利之辩的意义	(198)
一	真理的阶段性和分类	(198)
二	“道”的形而上与形而下	(203)
三	动机与效果的价值判断	(206)
四	心与迹	(209)
第五章	永嘉学派的崛起和朱熹的批判	(210)
第一节	绍熙二年：永嘉学派与朱子学的首次“相遇”	(210)

一	绍熙二年陈傅良、叶适与朱熹的通信	(210)
二	动机与效果	(219)
三	“打成一片，定是不可”	(220)
第二节	绍熙五年：朱熹、陈傅良的庙制之争	(224)
一	争论的由来和过程	(227)
二	朱熹的意见	(230)
三	陈傅良的《僖祖太祖庙议》	(231)
四	朱熹对陈傅良《僖祖太祖庙议》的批评	(234)
第三节	庆元年间：朱熹对永嘉制度新学最后的批判	(236)
一	朱、陈之间的分歧	(239)
二	朱、陈分歧的哲学背景	(244)
第六章	叶适：总结与创新	(250)
第一节	“心体”的解构	(253)
第二节	内外交相成的工夫论	(268)
一	对思孟学派经典的全面清理	(268)
二	叶适的认识论和工夫论	(277)
第三节	从“物极”到“皇极”	(284)
一	皇极与建皇极	(284)
二	物极	(287)
三	从“物极”到“皇极”	(290)
四	叶适“皇极物极”论的理论特点与贡献	(293)
第四节	叶适思想的价值和遗憾	(296)
一	对王霸义利之辩的回应	(296)
二	对陈傅良“制度新学”的总结	(303)
三	叶适思想的缺陷	(305)
第七章	求索中兴之路	(311)
第一节	南宋“士学”的改造	(311)
一	儒学：“未熟之五谷”	(312)
二	陈亮对南宋“士学”问题的思考	(315)
三	叶适的“吏士合一”	(318)
第二节	举步维艰的兵制改革	(321)
第三节	走出“郡县”与“封建”的悖论	(332)

一	过度郡县化：宋代积弱的原因	(332)
二	“郡县自治”与“稍复藩镇”	(334)
三	历史的回响	(339)
第四节	推进“共治”的探索	(341)
一	关于君臣关系	(343)
二	《周礼说》的意义	(349)
第八章	政治实践	(353)
第一节	围绕“恢复”理想的呼吁与抗争	(353)
一	陈亮的《中兴五论》	(354)
二	《淳熙四上孝宗皇帝书》	(360)
三	永嘉学派的“和战”主张	(364)
第二节	地方行政实践：以薛季宣与陈傅良为个案	(367)
一	薛季宣的州县生涯	(368)
二	陈傅良的地方行政生涯	(373)
第三节	从过宫到禅让：以皇位为对象的中枢政治运作	(378)
第四节	道学集团中的浙东学派	(391)
一	陈亮、叶适论淳熙道学集团	(391)
二	庆元党禁的爆发和叶适的反思	(396)
第九章	传播与异化	(407)
第一节	科举：浙东学派的传播策略	(407)
一	吕祖谦与“永嘉文体”的出现	(407)
二	陈傅良：永嘉学派科举的集大成者	(411)
三	“永嘉文体”的生命力	(415)
第二节	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——以陈傅良门人为中心	(421)
一	书院建设	(423)
二	协助著述	(424)
三	陪同游学	(425)
四	学术论辩	(427)
第三节	叶适门人的分化	(428)
一	吴子良：“学胜于文”	(431)
二	陈耆卿：从词章到义理之学	(433)
三	车若水：与水心之文决裂	(434)

四 舒岳祥：告别永嘉文统	(435)
第四节 朱子学对永嘉学派、永康学派的整合	(436)
一 陈振孙对浙东学者的评价	(437)
二 《读书分年日程》对制度新学的吸收	(446)
第十章 结论	(450)
第一节 二元论对二元论	(451)
一 徒法—徒善、成己—成物：孟子、《中庸》的二元论	(454)
二 道器一元论与认识的二元论	(458)
三 终极真理与次级真理	(459)
四 “法守”与制度新学	(462)
第二节 一元论对二元论	(463)
一 心与性关系的一元论	(464)
二 道与器关系的一元论	(468)
三 此“一元”非彼“一元”	(471)
第三节 南宋浙东学派的思想史定位：“前近代思潮”？	(477)
一 扭转“二度抽离”的尝试	(477)
二 “前近代思潮”视阈中的浙东学派之一：社会政治 观点的比较	(478)
三 “前近代思潮”视阈中的浙东学派之二：哲学思想的 转型	(482)
附录 本书相关要事年表	(488)
主要参考文献	(497)
后记	(503)

绪 论

第一节 朱熹指认的“浙学”及其流衍

正如何炳松所慨叹的那样：“在我国的文化史上要以浙东学派为最有光彩，同时亦要以浙东学派的源流为最不分明。”^①若以“浙东”为一个地理概念的话，那么自南宋孝宗朝（1163—1189）开始，浙东地区同时就活跃着朱子学、陆九渊（1139—1192，字子静）心学、浙东学派，以及介于三者之间的关键枢纽——吕祖谦（1138—1181，字伯恭）；进入理宗朝后浙东学派逐渐失去传承，朱子学渐为思想学术之大宗，陆学虽然不致失传，但影响已大大衰退。相沿至于元代，浙东朱子学以北山学派为代表，发展出了元明之际活跃于朱元璋政权中的浙东文人集团，其代表就是宋濂（1310—1381）、刘基（1131—1375），终结者就是方孝孺（1357—1402）。经过几代人的沉寂，至正德末年、嘉靖初年又勃兴了阳明学，在浙东乃至全国繁衍昌盛。阳明学嬗递至于明清之际，又涌现了刘宗周（1578—1645）、黄宗羲（1610—1695）。黄宗羲下开清代前期的黄百家（1643—1709）、万斯大（1633—1683）、万斯同（1638—1702）、邵廷采（1648—1711）、全祖望（1705—1755）代表的浙东经史学派。从上述极其简略的罗列中也可看出，浙东地区的儒学史几乎是近世中国哲学的具体而微的全息结构，若要在如此错综复杂、断断续续的各种思想传统中，绌绎出一条自宋至清前期一以贯之的思想逻辑，恐怕是勉为其难的。

本来，本书既然以南宋浙东学派为讨论对象，便首先要避免后世的

^① 何炳松：《浙东学派溯源》（初版于1933年）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47页。

“浙东学派”的认识史的干扰。可是，“浙东学派”这一概念并非产生于南宋，而是产生于清代中叶的章学诚（1738—1801）。假如笔者决定使用“浙东学派”这一概念来合称永嘉学派、永康学派的话，那么南宋以后的“浙东学派认识史”亦成了无法回避的思想史意义上的存在了。下面，就对从南宋到清前期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嬗变，作一简单的回顾。

一 朱熹所指认的“浙学”

在南宋时代，“浙东”从来就不是一个思想史的概念，而只是“两浙东路”这个行政区划的简称。在思想意义上被朱熹反复提及并严厉批评的只是“浙间”、“浙中”以及“浙学”。^①朱熹（1130—1200）在一封书信中批驳了陆九渊之学后说：“浙学尤更丑陋，如潘叔昌、吕子约之徒，皆已深陷其中，不知当时传授师说，何故乖讹便至于此？深可痛恨。”^②所谓“传授师说”是指吕祖谦，潘景愈（字叔昌）为吕祖谦门人，吕祖俭（？—1200，字子约）为吕祖谦胞弟，朱熹已隐隐指摘吕祖谦是“丑陋浙学”的源头。另外在《朱子语类》中也有这样一条：“江西之学只是禅，浙学却专是功利。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，无可摸索，自会转去。若功利，则学者习之，便可见效，此意甚可忧。”^③至于更下一层的地理概念“永嘉”、“永康”、“婺州”也在朱熹作品中出现，偶尔还将“永嘉永康”连称，且都具有思想倾向的意义：

陆氏之学虽是偏，尚是要去做个人。若永嘉永康之说，大不成学问，不知何故如此？他日用动静间全是这个本子，卒乍改换不得。如吕氏言汉高祖当用夏之忠，却不合黄屋左纁，不知纵使高祖能用夏时、乘商辂亦只是这汉高祖也，骨子不曾改变。盖本原处不在此。^④

这段语录特别值得注意。在朱熹作品的其他地方，吕祖谦、永嘉学

^① 集中见于黎德靖编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二、卷一百二十三（中华书局1986年版），散见其他各卷者不胜枚举。

^② 朱熹：《晦庵集》卷五十《答程正思》（所论皆正正确实），《朱子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327—2328页。

^③ 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三，第2967页。

^④ 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一十二，第2957页。

者、陈亮（1143—1195，字同甫）都被整合在“浙中士君子”、“浙间有一般学问”等概念下，只有这里是将“永嘉永康之说”与吕祖谦联系在一起。总体来看，即便朱熹没有在思想意义上使用“浙东”概念，他所说的“浙间”、“浙中”、“浙学”特指“浙东”，而不包括“浙西”。但是朱熹关于“南宋浙东学派”的总体论断却是下面一段话：

其学（字按：指吕祖谦）合陈君举、陈同父二人之学问而一之。永嘉之学，理会制度，偏考究其小小者，惟君举为有所长。若正则则涣然无统纪。同父则谈论古今，说王说霸。伯恭则兼君举、同父之所长。^①

这段话涉及了南宋浙东学派的所有重要人物：吕祖谦、陈亮、陈傅良（1138—1203，字君举）、叶适（1150—1123，字正则），并正面道破了吕祖谦之学与后三者之间的关系。尽管朱熹对吕祖谦有很多批评，但都仅限于指责吕祖谦没有给予陈亮、吕祖俭等晚辈正确的教导。这段话却明确地指出吕祖谦去世之前定型的思想学术，已经相当于陈傅良、陈亮二人的总和，这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结论。但是，引用这段话的现代研究者们并未细查其来源，^②而多从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一《东莱学案》转引。实际上，这段话并不见于现存的任何朱熹文集、语录之中，最早的出处是李幼武编纂的《宋名臣言行录外集》卷十三《吕祖谦·东莱先生成公》，此段文字夹杂于朱熹评论吕祖谦的若干片段之中，李幼武在引完这些片段后注明“并晦翁语”，而这些片段绝大多数能够在朱熹作品中找到出处，只有此条和此条之前的“伯恭之学大概尊《史记》，不然则与陈同父说不合，同父之学正是如此”一条是个例外。有一种可能是，此语确实出自朱熹并被记录、流传，但在朱熹文集、语录定稿时，被编辑者删去了，而李幼武在理宗朝编纂《宋名臣言行录外集》时还能看到有关记录并将其收入。

到了宋末元初，刘埙（1240—1319）明确地提出了“乾淳间，浙学兴”之说，凸显了吕祖谦的“浙学宗主”的地位：

^① 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一《东莱学案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五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3页。“若正则则涣然无统纪”一句，《宋名臣言行录外集》卷十三《吕祖谦·东莱先生成公》中无“无”字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49册，第10页。

^② 譬如如何炳松《浙东学派溯源》第六章，第154页；董平、刘宏章《陈亮评传》，第436页。

宋乾淳间，浙学兴，推东莱吕氏为宗。然前是已有周恭叔、郑景望、薛士龙出矣，继是又有陈止斋出，有徐子宜、叶水心诸公出，而龙川陈同父亮则出于其间者也。当是时，性命之说盛，鼓动一世，皆为微言高论，而以事功为不足道，独龙川俊豪开扩，务建实绩。^①

刘埙把吕祖谦作为“浙学宗主”，而薛季宣（1134—1173，字士龙）、陈傅良、陈亮、叶适都是其代表人物，指出“浙学兴”的问题意识来自“当是时，性命之说盛……而以事功为不足道”。刘埙虽然从正面阐述了“浙学兴”的原因，但其思想实质与李幼武所引朱熹的“其学合陈君举、陈同父二人之学问而一之”完全吻合。不过，当有人提出吕祖谦之学叛离了道学成为经世致用之学时，^②朱熹当即反对：“所与子约书甚善，但谓东莱遗言有涉于经济维持者别为一事，而异于平日道学之意，则恐亦未免有累于东莱也。”^③而朱熹的高足陈淳（1159—1223）也对吕祖谦与永嘉学派、永康学派的关系作了这样的区别：

浙中之学有陈、吕之别。如吕以少年豪气雄大，俯视斯世，一旦闻周程朱张之说，乃尽弃其学而学焉，孜孜俯首为圣门钻仰之归。未论所至之何如，只此勇于去邪就正一节，深足为至道者之观，亦吾名教中人。如诸陈辈，乃鄙薄先儒理义为虚拙，专驰骛诸史，捃摭旧闻

① 刘埙：《隐居通议》卷二《龙川功名之士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第19页。

② 本书将反复使用“道学”、“理学”、“宋学”、“程学”等概念，这些概念在宋代就存在不同的理解，故不得不先加以说明，以免混淆。譬如朱熹此处的“道学”为狭义用法，特指以二程为代表的北宋五先生（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二程）之学；但南宋的“道学”也有一种广义的用法，即被视为一个政治派系，其中包括了朱子学、陆九渊心学、蜀学、浙东学派（详见本书第八章第四节），对象相当于整个宋代新儒学。本书所用“道学”兼有狭义、广义两种用法，具体含义视语境而定。本书所称南宋时代的“理学”，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，狭义的“理学”是与陆九渊心学相对应的，特指程朱理学，广义的“理学”则是朱子学和陆九渊心学的合称，与浙东学派相对应。本书所称“宋学”，相当于北宋新儒学运动中出现的所有派系，包括王安石的新学、程学（洛学）、蜀学以及这些派系在南宋的传承。本书所称“程学”，特指程颢程颐之学，在淳熙年间南宋各学派的分化前，“程学”是南宋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思潮，吕祖谦、薛季宣、陈亮、陈傅良、叶适、陆九渊都曾受其深刻影响。至淳熙年间学派分化后，朱熹自称为“程学”道南一脉的正宗，陆九渊的象山学派、永嘉学派、永康学派也不再以程学为旗帜，“程学”这一概念逐渐走入历史。

③ 《晦庵集》卷五十四《答路德章》（“所与子约书甚善”），第2560页。

为新奇，崇奖汉唐，比附三代，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，曰：“此吾所以为道之实者。”兹又管晏之舆皂，而导学者于卑陋之归也。^①

陈淳把吕祖谦归入“吾名教中人”，从而与“诸陈”（陈亮、陈傅良）截然分开，把朱熹与吕祖谦的分歧用“未论所至之何如”轻轻带过。这显然是出于和朱熹同样的策略考虑，即吕祖谦毕竟是朱熹最重要的学术伙伴，如果将其贬低为陈亮、永嘉学派一流，受到伤害的反倒是朱熹和“道学”本身。因此，维护“东南三先生”牢不可破的形象这一点成了程朱理学内部的共识。宁宗嘉定九年，张栻（1133—1180）与吕祖谦一同赐谥，理宗景定二年，二人又一同从祀孔庙，即证明了这一点。朱熹去世后，下一代学者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格局，刘宰（1167—1240）在致魏了翁（1178—1237，字华父）信中说：

天下学者，自张、朱、吕三先生之亡，怅怅然无所归。近时叶水心之博，杨慈湖之淳，宜为学者所仰，而水心之论既未免误学者于有，慈湖之论又未免诱学者于无，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，孰能是正之？^②

类似的说法很多，由于上面指出的原因，吕祖谦被从“浙学”谱系中抽离出来，叶适与吕祖谦似乎毫无关联。黄震（1213—1281，字东发）在《日抄》中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图式，即朱熹、陆九渊、陈亮、陈傅良为南宋学术的四大家，而叶适“混然于四者之间”，故实为五大家：

愚按乾淳间，正国家一昌明之会，诸儒彬彬辈出，而说各不同。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，工夫细密。而象山斥其支离，直谓即心是道。陈同甫修帝王霸之学，欲前承后续，力拄乾

^① 陈淳：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三十三《答西蜀史杜诸友序文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1168册，第762页。对这段话的分析可以参考何俊《南宋儒学建构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31—332页。

^② 刘宰：《漫塘文集》卷十《通鹤山魏侍郎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1170册，第408页。

坤，成事业而不问纯驳。至陈傅良则又精史学，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。其余亦各纷纷，而大要不出此四者，不归朱则归陆，不陆则又二陈之归，虽精粗高下，难一律齐，而皆能自白其说，皆足以使人易知。独水心混然四者之间，总言统绪，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，则似不满于陆；又以功利之说为卑，则似不满于二陈；至于朱则忘言焉。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？然未尝明言统绪果为何物，令人晓然易知如诸儒者。^①

不难发现，吕祖谦、张栻二人被朱熹一派（黄震）“吸收”得无影无踪，朱熹表面上是孤身一人面对陆九渊、陈亮、陈傅良、叶适，实际上代表了吕祖谦、张栻，合“三先生”之力构成所谓“正学”打击上述异端。这样一来，陈亮、陈傅良、叶适等人就承受了来自程朱一派学者的最多的批评。即便以温和著称的黄干（1152—1221，字直卿）也嘲笑陈傅良、叶适：“而世所谓儒者又多虚言以欺人，而实自欺，仙乡诸长上为尤甚，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职，而后生为其所惑，甚可怜也。”^② 魏了翁批评陈傅良、陈武“判道、法为二”，实乃继承王安石的衣钵。^③ 真德秀（1178—1235，字希元）贬低叶适的《习学记言序目》为“放言”。^④ 陈振孙（1215—1262 在世，字伯玉）批评叶适“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”。^⑤ 正是这些批评反映了“乾淳学术”的朱学、陆学、浙学格局三足鼎立的新模式逐渐得到公认。

至元修《宋史》时，吕祖谦、陆九渊、薛季宣、陈傅良、叶适同入《儒林四》（卷四百三十）、陈亮入《儒林六》（卷四百三十六），张栻则入了《道学传》，与朱熹分享同一卷（卷四百二十九），对“东南三先生”这样区别对待，似乎反映了“浙学宗主”的阴影还笼罩在吕祖谦头上。

① 黄震：《黄氏日抄》卷六十八《读叶水心文集·敬亭后记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708册，第639页。

② 黄干：《黄勉斋先生文集》卷十五《复王主簿》，“王主簿”系温州人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第82页。

③ 魏了翁：《鹤山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一百〇四《周礼折衷》，四部丛刊初编本，第207页。

④ 叶绍翁：《四朝闻见录》甲集《宏词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35页。

⑤ 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“习学记言”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313页。陈振孙在世时间据陈乐素考证，同上书，第698—701页。

二 “互补”模式的出现

上述状况的一个原因是，随着朱子学自身在南宋后期出现了种种弊端，有人在思考能否将“浙学”吸收进来，以弥补朱子学的不足。早在黄干在世时，就曾说：“君举陈丈，于大经大本固难责以尽合，然闻其于制度考证亦颇有过人处，善取人者，亦资其长以益己而已。”^①“大经大本”固然是朱子学理论的核心，但“制度考证”也是朱子学的一部分（尽管不是核心的部分），两者具有相互借鉴的可能性。

另外一个原因是，永嘉学派的主要人物在孝宗、光宗两朝与朱熹同为政治意义上的“道学集团”中人；陈亮虽自称并非其中一分子，但与朱熹也有很深的私交，故将南宋“浙学”描述成朱子学的同盟离史实不远。理宗嘉熙二年（1238）五月，诏赐陈亮谥文达。^②促成此事的是陈亮的东阳同乡兼同年进士乔行简（1156—1241，字寿朋），行简为吕祖谦门人，由于乡谊和同科的关系十分推崇陈亮。他在为陈亮、吕祖俭请谥的奏札中说：

（陈亮）以特出之才、卓绝之识，而究皇帝王伯之略，期于开物成务，酌古理今，其说盖近世儒者之所未讲。平生所交如熹、枋、祖谦、九渊皆称之曰：“是实有经济之学。”……至若亮当渡江积安之后，首劝孝宗以修艺祖法度为恢复中原之本，将以伸大义而雪仇耻，其忠与汉诸葛亮、本朝张浚相望于后先，尤不可磨灭。^③

乔氏对陈亮的价值作了三点肯定：一是陈亮之学为“近世儒者之所未讲”，即隐晦地表示陈亮可以作为朱子学有益的补充；二是朱熹、张枋、吕祖谦、陆九渊对陈亮的肯定；三是陈亮生前力劝孝宗北伐，乔氏上奏时离“端平入洛”不到四年，蒙古对南宋的威胁日益明显，表彰陈亮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。在朱子学全面官学的气氛下，这一赐谥行动虽然令人颇

^① 黄干：《黄勉斋先生文集》卷八《与胡伯履西园书》（“干贱迹如旧”），第19页。

^② 佚名：《宋史全文》卷三十三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228页。《宋史·陈亮传》作“谥文毅”，时间在“端平初”。

^③ 吴师道：《敬乡录》卷十三《奏请谥陈龙川吕大愚札子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第48页。

感突兀，却也暗示了朱子学和浙学存在互补的空间。

入元后，朱子学教育家程端礼（1271—1345）对薛季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：“余谓士之谈《诗》《书》而略事功，其来已久，遂使俗吏嗤儒为不足用……余少读薛常州《行述》，窃欣慕之，盖其学本濂洛，其自得之实，于经无所不合，于事无可不行，莅官文武，应机处变，政无巨细，靡不曲当。”^①薛季宣“学本濂洛”，又有经世应变、建立事功的本领，俨然是一个完美的学术典范。我们可以把这种将“浙学”定位为主流思想的补充者的思路，命名为“互补”模式，而有别于朱熹、陈淳等视“浙学”为异端的“对抗”模式。

三 明代对南宋“浙学”的认识

入明以后，“浙学”由于失去传承，“三足鼎立”的格局逐渐在人们心目中黯淡，吕祖谦与永嘉学派、永康学派的关系也很少为人注意。明初黄潜（1277—1357）的一段论述反映了这一点：

盖婺之学，陈氏先事功，唐氏尚经制，吕氏善性理，三家者唯吕氏为得其宗而独传。至于人自为书，角立竞起，吕氏终莫能挈而合之也。其在温则王道甫之慷慨名义，尝合于陈氏矣，而其言无传焉；陈君举本薛士隆，上下古今而和齐斟酌之，以综世变为说，不皆与唐氏合，其廛存者，亦莫之传也。叶正则推郑景望、周恭叔以达于程氏，若与吕氏同所自出，至其根柢六经，折衷诸子，剖析秦汉，论于五季，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，其传之久且不废者，直文而已，学固弗与焉。^②

黄潜认为吕祖谦之学“得其宗”，即最为正统，但他在世时晚辈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思想分歧，吕氏无力调和。等到他去世之后，“人自为书，角立竞起”，分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。黄潜特别指出，叶适之学“无一合于吕氏”。这样一来，吕祖谦与永嘉学派、永康学派的关系便被彻底撇清了。

^① 程端礼：《畏斋集》卷三《送薛学正归永嘉序》，丛书集成续编本，第48页。

^② 黄潜：《文献集》卷五《送曹顺甫序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第196页。

最具讽刺意义的是，刘麟长编的《浙学宗传》（编于崇祯十一年）虽然以“浙学”为名，入选人物都属于朱、陆两大传统，且以陆王为主线，南宋“浙学”谱系中人只保留了吕祖谦，而陈亮、陈傅良、叶适都无迹可寻。这几乎可以代表明代儒学史著作的全貌。譬如黎温《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》（成化四年刻）、杨廉《增补伊洛渊源录》（弘治九年刻）、程瞳《新安学系录》（正德三年刻）、李人龙《道统集》（嘉靖三十五年刻）、王圻《道统考》（万历十三年刻）、周汝登《圣学宗传》（万历二十三年刻）、过庭训《圣学嫡派》（万历四十一年刻）、唐鹤征《宪世编》（万历四十二年刻）、孙奇逢（1584—1675，字夏峰）《理学宗传》（康熙五年刻）等，均未收入陈亮、陈傅良、叶适，而大多数收入了吕祖谦。^①

一方面，全国性的儒林传、道学传删去了永嘉、永康诸儒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所在的金华、温州两地在明代编纂了很多地方历史文献，在这些文献中，或没有出现陈亮与叶适的名字，或被归入“儒林”。在王朝佐编的《东嘉先哲传》中，前五卷为“先达”（王开祖、林石）“程子门人”两卷、“朱子门人”两卷，从第六卷到第八卷为“儒林”，才出现了薛季宣、郑伯熊（1124—1181，字景望）、陈傅良、蔡幼学（1154—1217，字行之）、叶适，这显然是根据与程朱道统的距离来排列先后的，思路与《宋史》一致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金华。早在元代，吴师道（1283—1344）就从表彰乡贤的目的出发将陈亮收入《敬乡录》，却又承认：“其学之未粹，则世自有定论云。”^② 赵鹤编、张朝瑞重辑的《金华正学编》主要记载了朱学的传承，吕祖谦以下直接金履祥，略去了陈亮、吕祖俭。^③ 应廷育编的《金华先民传》中，陈亮、吕祖俭入《儒林传》，而吕祖谦入《道学传》。^④ 章一阳编的《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》，章一阳《序》介绍了吕祖谦与张栻、朱熹讲道丽泽书院后，紧接着写道：“于是间气毓祥，北山何文定公亲承紫阳高第黄文肃公之业……”^⑤ 显然章一阳注意到了从吕祖谦到金履祥、何基有两代人的空缺，因为无法以客观的授

① 荒木见悟：《道统论的衰退与新儒林传的展开》（初刊于1989年），吴震、吾妻重二主编《思想与文献：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3—25页。

② 吴师道：《敬乡录》卷八《陈亮》。

③ 万历十八年刻本，收入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97册。

④ 收入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史部第91册。

⑤ 《四库存目丛书》经部第162册，第554页。